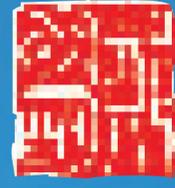


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的體制

亟須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鄭明明題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太平紳士 中華慈善總會創始人
 全國政協委員 北京海外聯誼會副會長
 香港保良局歷屆主席會創會主席
 香港保良局壬辰年主席
 中國殘聯文化助殘愛心大使 國際著名影星

陳玉書
 鄭明明
 梁王培芳
 梁寶珠
 張柏芝



（一）

幾個月前，北京的權威傳媒《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引人深思的文章。文章的題目極具震撼力，叫做《中國慈善事業遭遇空前的信任危機》。文章說，「從中國紅十字會到中國慈善總會、宋慶齡基金會……國內慈善組織連遭一系列的信任危機。郭美美事件所引發的問號，豈止是紅十字會一家之痛，而是整個公益慈善事業之憂。」

應當說，中國公益慈善事業被公衆病痛的隱痛、隱憂和危機，乃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僅以剛剛過去的2011年度為例，新春伊始就有上海瀘浦區紅十字會餐餐豪飲的「萬元大餐」；未及入夏則有高調慈善被指有失誠信之困；暑熱炙人又有基金會管委會出納員私吞善款80萬元令人拍案驚奇；接著，那位郭美美小姐網路喧嘩使紅十字商標為千萬夫所指；隨後，中華慈善總會上演「發票門」事件；河南宋慶齡基金會塑造「黃河女兒」，爆出多年涉足房地產及投資放貸整密高利等戲碼；「粉墨登場。類似問題至今仍延燒不已，舉凡血疑誘發空關血荒；仁愛基金會騙捐案相繼國企而備受譴責等資訊，被公衆和傳媒曝光，受到廣泛質疑。特別是近來，四川災區由本港善款援建的高爾樂民族中學只使用一年就被當地拆除，香港特區政府迭次申明要收回200萬元善款，引發海內外輿論的強烈關注……

看來，空前的信任危機所引發的危機也是空前的。已經有80%以上的網民表示不再捐款給紅十字會；更有甚者，一些憤怒的曾經捐款的家長喊要「中紅會還錢！」於是，海內外看到，從2011年下半年開始，無論是中國紅十字會，還是中華慈善總會等各地各類公益慈善組織，接到的善款數額在急速的垂直下降。據有關方面估計，2011年全國內地公益慈善組織接受的捐助應同比驟減數百億元人民幣。

在探討內地公益慈善事業遭遇空前信任危機的時候，多數立論認為是中國公益慈善機構的內幕重重，不公開、不透明所致。誠然，「不公開、不透明」或者直白地說「慣於暗箱操作」，確係釀成危機的直接或導火索。僅據內地民政部下屬的民政慈善捐助資訊中心發布的《2010年全国慈善組織資訊披露現狀報告》稱，「國內地75%的慈善組織的善款流向不透明」！同樣在國家民政部所屬的中國公益慈善資訊披露現狀報告表明，中國內地有42%的慈善組織沒有專門的資訊披露辦法，37%的慈善組織沒有專人負責資訊披露工作，90%以上的內地公衆不受目前的披露程度和方式。

但是，僅僅按披露的程度和方式有毛病就導致了內地公益慈善事業遭遇空前信任危機了嗎？

請想一想：郭美美的舉止，不過是一個小小女孩子虛榮、浮華、淺薄、無聊的行為，在網上曬「數秒鐘的圖劇」，為什麼會動搖有着悠久歷史的內地公益慈善機構和公益慈善事業呢？在具有強大而龐大的執政力量及嚴密的執政社會網絡的內地，在官方建立和強力支撐下的官督官管的信譽的公益慈善組織，為什麼面對一個無知女孩的挑戰，竟然脆弱得不堪一擊呢？

中國著名的古典文獻《韓非子》中，有一篇哲理深刻論及人口的名篇，被今人通常命題為《扁鵲見蔡桓公》。名醫扁鵲見蔡桓君主相侯時說：「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不可不慎於病疾起醫，聲稱自己「寡人無疾！」且貶斥地說：「醫之好治無功以為功。」

內地的公益慈善事業資訊不公開、不透明，是外表的腫脹、內部的之疾。這種疾患延續已數十年矣，一旦遭遇的危機，卻是由深重的體制性缺陷造成的。內地公益慈善機構公信力的嚴重喪失，不過是體制性缺陷所染生的頑疾而已。

中國內地的公益慈善事業，該怎麼辦呢？

（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中國近現代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歷史上，台灣、香港、澳門的工作業，貢獻甚多。

祖國寶島台灣的社會福利事業和公益慈善機構，在第三次國內戰爭以後，伴隨《四國公報》龍頭崛起的，快速地發展壯大。其中最著名者，如慈濟功德會、國際佛光山世界總會等，以佛智為懷，大慈大悲，愛心濟世，拔除幹癬，救助孤老弱病，補善社會，規模宏大，影響深遠。例如慈濟功德會除幹癬中心已建成血為亞洲最大的骨質庫，為全球患癌症的華人提供骨髓移植，挽救多少生命於既倒。台灣天主教會創辦了星羅棋布的醫療院所，從事育嬰、撫殘、康復、安老、賑災等善舉，名聞遐邇。台灣經濟發展會在中國內地貧困地區舉辦小學和醫院，大震災中大顯身手，多方救助。他們還投身於世界性救災，像南太平洋海嘯、日本大地震期間，出生入死，派人派錢派物，顯示了中華民族歷史悠久的慈善救災情懷。

澳門人口雖少，但市民捐款眾多。不僅救濟澳門，而且對內地災難也慷慨解囊，功不可沒。

東方之珠的香港，其公益慈善事業較之台灣、澳門，歷史更顯悠久。無論是東華三院、保良局、樂善堂，還是紅十字會、博愛醫院等等，公益慈善的口碑頗傳於滬內外。本文的作者均係香港人，又都是本港公益慈善事業的積極參與者或慈善機構的領導人。其中的鄭明明女士膺蒙「國際樂善教母」稱號，事業成功的英名遠播海內外，是港府「熱心公益獎」的獲得者。她不遺餘力地積極參與社會服務，秉持「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人生信條，致力扶助本港婦女、兒童、殘病等弱勢群體。她創立的「鄭明明慈善基金會」，為本港和中國內地的青少年，提供了健康和均衡發展的機會。鄭明明用其基金會的主題——「創造美觀

人生」——為中國的公益慈善事業書寫了一段精美的篇章。近三十多年來，她個人捐獻已超過500萬元港幣，領導籌募捐款已超過3200萬元。著名影星張柏芝，在本港號召發起LOVE LIFE活動，為台灣癌症病童籌款；亦支援國際醫藥人道組織的無國界醫生籌款。在出席「奧比斯精彩無障之旅」時，她捐贈100萬元關注眼健康。在印地地震海嘯後，她親赴災區慰問流離失所、痛不欲生的災民。在香港回歸祖國15周年之際，應國家文化部和中國殘聯之邀，張柏芝被授予「中國殘聯文化助殘愛心大使」的光榮稱號。本文領銜、主筆的陳玉書先生，數十年如一日以公益慈善為己任。他和梁王培芳女士、梁寶珠女士先後出任香港保良局的主席。梁王培芳女士是英國MBE及OBE勳章和香港特區政府銀紫荊星章和金紫荊星章的獲得者，並連獲19年獲選保良局歷屆主席會主席。梁寶珠女士曾任保良局的總理、副主席和保良局主席，是本港幾家基金管理委員會和婦女福利會的會長。保良局屬下九十多間學校的註冊校監，也是廣東省暨中山、順德、佛山、江門、新會語地婦女兒童福利會的領導成員。多年來她為香港及內地慈善事業累計捐款數千萬之鉅。

本文就以香港保良局為例，研析香港公益慈善事業的體制和成就。這就是保良局的大慈善家鄧肇堅爵士、李兆忠先生和馬錦明博士的鑄像。「惠澤永流，德蔭長存」的鄧肇堅，「安良保赤，澤蔭無窮」的李兆忠，「博施濟眾，仁德同風」的馬錦明，以大慈大善報國民，受到世世代代港人的景仰。保良局就是在許許多多慈善家的殷勤努力下誕生和發展起來的。

十九世紀末葉的本港，社會矛盾突出，貧富差距加大，社會秩序混亂，誘拐婦女兒童，逼良為娼，娼嫖相繼流風甚至蔓延遍布各處的院樓堂館所；販賣人口，販賣毒品弊案屢禁不止，社會腐敗，道德淪喪。1878年底至1879年初，富有良知、仗義救世的東莞商標名上書當時管治香港的港督軒尼詩爵士，申請成立以「保赤安良」為目標的「保良局」。此議很快獲得港督批准。進而在1893年由英國的理藩部通過《保良局條例》，並刊於英王國憲報。

保良局初期作為公益慈善者，主要致力於保護孤寡殘弱等弱勢群體，並協助國民政府調解鄉鄰家庭糾紛。隨著本港經濟、文化、教育的发展，保良局已建設成龐大的社會服務機構，以現代化與高度經濟效益的管理模式，而向全體市民，提供優質的多元化的綜合服務。

保良局的價值觀，通常被概括為「優良傳統、優質服務、多元進取、善有善報、愛心情懷」。保良局的願景是成為最傑出及多元化的慈善服務團體，領導善業，造福群群，為國際所廣泛推崇。保良局的慈善理念和踐行原則，有如下的局歌所歌頌的那樣：

「人間沒有愛，幸福哪裡來？人與人之間，拿出來一點愛，讓整個世界都能好起來。捨棄一點點，把它聚起來，幫助困難的人，脫離苦海。幼事不再，有戰事不戰，這一切都來自你的愛。」

在這貫橫而充滿擊掌的歌聲中，保良局的同仁世世代代向港島內外，向國內外，所提供的社會服務、文化服務、教育服務等內容，十分豐富，十分熱忱。特別是其中的綜合家庭服務、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弱能康復及護理安老服務、傷殘病患診治、災難救助服務，使受益者不計其數。

縱觀本港公益慈善事業的體制，有明顯的特徵值得研究和總結：

其一，本港的公益慈善團體和機構，種類齊全，數量繁多，社會服務覆蓋到各個階層、各個社區、各類人群，幾乎無所不備。更有私人創辦的基金會，如全國政协副主席霍英東創辦的霍英東基金會，當下的李嘉誠基金會等，另闢蹊徑，廣布善施，簡言之，只要社會有需要，無論多麼微細多麼艱難，本港都會有公益慈善組織應運而生，傾力服務。

其二，基督教、道教、佛教等宗教團體的公益慈善機構發揮了巨大的無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基督教勵行會為本港失業者、外傭、新居港人士提供就業、培訓和輔導；道教機構提供護理、安老的服務等等。宗教團體廣結善緣，廣泛開展多種慈善服務，社會效果明顯。

其三，本港的公益慈善機構悉由民辦，但港府承擔社會福利的責任，由官方政府向公益慈善機構按撥款以運作。

其四，免稅優惠。香港有700萬居民，僅相當於內地一箇中等城市的人口，但享受免稅的公益慈善組織就有4000多家。

其五，官民分工協作。促進社會服務。政府負責規劃，制定政策，提供經費，實施監督；而民間公益慈善組織則堅持非營利性、非政府性，專責進行社會服務。

其六，注重並大力弘揚慈善文化，把古聖先賢的德教，民風民俗的



由王震、崔乃夫簽署的「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捐贈證書（左），陳玉書先生的「中華慈善總會創始人」證書（右）

積聚，東方宗教的教旨和西方人道主義的內涵熔冶一爐，為善行善舉所用。

其七，在財、物的審計監管方面，嚴格遵守法規，尊重捐款人的意志、意願，確保資訊公開、透明，為了確保專款專用，公益慈善機構每年歲尾都會請權威的國際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審計結果在年報中詳加公告。審計過後，要將其中的捐來來源，善款物去向，——在網上或信上或電話告知公布，隨時提供查詢。凡屬數額較大的捐贈，會以圖片、視頻、資料等形式報告財務運行的微觀情況；凡屬小額捐贈，也隨時接受追查甚至追責。

其八，本港的公益慈善事業，堅持鲜明的善愛博施的倫理道德特徵，並嚴守捐贈者意願至上的慈善行為準則。

堅持善愛博施，方能呼喚起廣大民眾自覺參與慈善捐獻的積極性，厚植公益慈善事業的經濟基礎。在行善博施的慈善行為中，不折不扣地遵循公益慈善事業的體制制約至至高無上的準則之一，必須嚴守不違。凡發生違背捐獻者本意的行為，捐獻者就有權拿回自己捐贈的善款。這項鐵則的實行，廣泛見於世界公益慈善事業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因此，本文前而提到的港府要收回災後援建高爾樂民族中學的200萬元善款，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這恰恰是本港公益慈善事業體制優越性的表現。



鄧肇堅爵士銅像，李兆忠先生銅像，馬錦明博士銅像

（三）

香港的現代公益慈善事業體制，是在英國近百年對本港的管治下成長發展起來的。可以說，本港的公益慈善事業脫胎於英國的體制，有着英國公益慈善事業體制的特徵和印記。

英國，作為世界上最早又最老的資本主義國家，其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和成熟，有着近千年的歷史。

早在西元十二至十三世紀，英國的教會就開始生理規模化的慈善事業。當時先後誕生的數百年民間慈善服務、文化服務、教育服務等內容，十分豐富，十分熱忱。特別是其中的綜合家庭服務、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弱能康復及護理安老服務、傷殘病患診治、災難救助服務，使受益者不計其數。

對於英國公益慈善事業體制的研究和分析，應該得出以下客觀的結論：

一、英國對公益慈善事業重在進行日臻完善的立法、修法、執法的法制管理。

世界上第一部《慈善法》早在五百多年前誕生於英國。之後幾度修訂，不斷擺脫和克服體制性的缺陷，使公益慈善事業完全納入法制管理的軌道。特別是到2006年，英國再度修訂頒布了《2006年慈善法》，使其現代化的法制管理體制和監管達到新境界。《2006年慈善法》不僅確認了國家、政府與民間公益慈善組織在建立社會價值方面的共識與互動，尤其確立了「國家、政府對民間慈善組織暨非營利公益機構的監管體制。這部《慈善法》及其配套法律的實施，進一步鞏固了公益慈善組織的社會能動性，也強化了政府監督的職能和模式。

二、實現現代化的法制監管，必須堅強現代化的權威的國家公益慈善管理機構。一方面要規避監管工作的衙門化、官僚化、操作暗箱化；另一方面要規避多頭分管、多頭行政，多方推諉。

英國依據《慈善法》設立了權威的國家慈善委員會。該委員會主席由英國女王欽命，不受內閣大臣或任何政府部門管轄，是獨立於議會和政府內閣之外的依法獨立、代表王室進行使職權的機構。該會工作人員均屬國家公務員，經費由國家財政全額支付。舉國的公益慈善組織的報告，悉由該會主持、統轄、管理；所有的審計、賬務檢查均向該會報告並接受其監察、處置。

三、英國的公益慈善事業的體制中，浸透着基督教的宗教慈善理念，用它來引領公衆和公益人士的信仰、道德和行動，使生命平等、世人關愛、社會和諧成爲守則和信條做到平民慈善，人人參與。因此，捐贈公益慈善的善款、善物日漸增多。據英國方面近年的年度統計資料顯示，英國個人捐款的總額每年約800億元人民幣左右；英國公民人均的年度捐贈款額折合人民幣約1800元（按：2000年的資料顯示，中國的人均年度慈善捐贈額不足1元人民幣）；英國參與捐贈的人口佔全國國民的70%以上。

四、英國的體制確保了公益慈善事業的民間性和獨立性；而公益慈善組織的運作，則主要依靠和動員大量的志願者。

英國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和提供公共服務上，在社會管理的調整和拓展上，都會與公益慈善組織協商合作，但是公益慈善組織的民間性和獨立性不受侵擾。公益慈善組織所代表的公衆利益，使它享有不衰的公信力。據報道，在英國的公益慈善從業人員中，絕大部分是志願者，並不享有報酬，只是自覺自願地爲社會盡力。

五、英國的公益組織遍布於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並具有專業分工的特性。

據不完全統計，英國總共有近四十個門類的公益慈善機構，分布廣泛，有的屬於國際性，有的屬於全國性，有的屬於地區性，有的屬於社區性。這些機構所進行的公益慈善活動，具有明確的專業目標和專業屬性。他們的專業類別繁多，比如對不同的社會群體、對不同的社會問題、對貧困和社會福利、對婦女兒童、對養老、對教育、對宗教、對法律、對環境保護生態滋養、對歷史文物遺產保護，甚至對各種不同動物的反虐待和保護等等，都有專業的公益慈善組織。公益慈善的組織和專業，涉及和覆蓋到人類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有效地促進和提升了社會的管理功能。

六、政府對公益慈善組織給予必須的資金支援，包括用基金方式提供專項或基金的支援。特別是創造性的推行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將原來由政府承擔而且又不堪重負的社會服務，改爲提供資金，交由公益慈善組織經營管理，既出色地完成了相關的社會服務；又強化了政府監管的職能和模式；還使得益公益慈善組織在運用政府資金和所有公益性資源時，不得不得公開透明，接受有力的監督。

在英國的體制中，還強調國家和政府要資助、購買多元化的不同專業不同類型的民間公益慈善組織及其服務時，要一視同仁，一視同仁，施行公平、公正、公開的「三公」原則。

政府在購買服務和監管社會公共服務的過程中，以現代化的法制方式引導公益慈善組織健康、活躍地發展，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亂。

七、英國體制中的社會型企業，在公益慈善事業發展史上具有穿越傳統的重要的創新意義。這種社會型企業，不但兼持了「變輪船功能爲造血功能」的理念，而且以企業化的運作方式創新了公益慈善事業的可持續發展。社會型企業，包括公益創投方面的實踐公益發展，提升和強化企業的社會責任及公益慈善功能上發揮着巨大的作用。

現代公益慈善事業的體制，在全球已有不少成熟的經驗。儘管我國國情不盡相同，不能完全照搬照抄，但是那些具有普世價值的東西還是應該廣泛交流並汲取。譬如美國公益慈善體制中的服務宗旨、服務物件、服務方式方法、服務規則等，似可擇其善者而用之。以美國而論，它在在的人口約爲中國總人口的1/5到1/4，可是其公益慈善組織卻是中國的4倍左右。美國的志願者組織多達100多萬個，志願者服務幾乎無處不在。美國有總人口75%以上的個人爲公益慈善事業捐款；以家庭統計則有全美90%以上的家庭爲公益慈善事業捐款。再譬如德國，其全國總人口不足中國的1/17，但現有的公益慈善組織卻比中國多二十萬家。這些公益慈善組織每年約能募集500億元人民幣的善款，還爲社會提供150萬個就業機會和崗位。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成熟經驗表明，在多元化、全覆蓋地爲社會服務的過程中，務必引領公益慈善組織實現專業化、在公益慈善行為中，要有明確的專業服務工作目標和可行可變的專業方案爲準則。

（四）

公益慈善事業，是全人類具有普世價值的崇高事業。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水準和成就，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的文明、進步和幸福程度的標誌，是保障民生、民主，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實現人民有尊嚴的生活的重要內容。

中國內地的公益慈善事業，自改革開放以來，伴隨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準的不斷提高，已經取得長足的進步。特別是在巨大變革和重大的國際活動方面，中國的公衆和公益慈善組織均表現出巨大的熱情和竭誠誠摯愛心的寶貴品格。在平素的日常生活中，扶危、濟困、安老、恤孤、助殘、支助、救災濟濟方面，都有傑出的表現，不遺餘秀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事蹟。這在中國乃至世界當代公益慈善史上，都書寫了光輝的一頁。

但是，中國內地的當代公益慈善事業，奉歷史短流，受到體制、理念和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環境的制約和影響，存在着一系列體制性的缺陷和不足。這種體制性的缺陷和不足，特別是領導體制方面的缺陷、立法和制度的缺陷、公益慈善組織和運行體制方面的缺陷、社會及公衆的公益慈善理念、意識方面的缺陷等等，一定程度上障礙着公益慈善事業的正常發展、健康發展。

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的體制性缺陷，必須也只能以體制性的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來解決。

首先，應該逐步切實執行黨和國家對公益慈善事業領導、管理體制的改革。不宜用領導黨組織、領導行政機關的體制，而應當建立、建設符合公益慈善事業的各類職能、普遍規程的體制來科學地進行領導。

其次，應該盡快制定並修訂《慈善法》。儘管內地已有《捐贈法》和某些管理條例，但還不足以構成當代公益慈善事業完善的法律體



鄭明明捐款60萬元給香港公益金

制。特別是對公益性、非政府性、非營利性及志願性的慈善組織，在法律上的科學定位、科學管理、科學活動的程式以及科學監管的運行機制，需要準確而明確的規範和配套的法律體系。慈善法決的長期缺位，必然造成長期的體制性和法制性的缺陷。

第三，應該配合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方針，制訂公益慈善事業長期發展的戰略規劃，制訂並實施公益慈善事業發展的基本國策，構建規範、指導、保護、促進公益慈善事業發展的權威的國家監管機構和社會監管體系。

第四，在社會核心價值的宣導和踐行中，在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中，要注重傳承中華文化寶庫中慈善濟世、仁愛、仁和、仁政的傳統，以及世界文明中平等、博愛的人道主義精神，在全民族中形成廣泛的盡人皆知、盡人皆行的公益操守和慈善助人的意識及品行。

特別要引導和樹立科學的社會價值觀和現代的公益慈善財富觀。無論是自然人還是法人，其價值觀均應反映出對社會的奉獻、爲社會服務的公益價值。現代公益慈善財富觀，不僅應有「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特徵，還須做到在取財的過程中，感恩社會、回饋社會、公益慈善，在社會財富的生產和流轉中，增強動態平衡的自覺性，主動地進行社會財富的再分配。當中國內地的貧富差距加大，社會矛盾激增，某些「先富起來」的豪爺們兒，缺乏現代公益慈善財觀念，甚至爲富不仁，違法違章巧取豪奪；賺了錢不是自己花天酒地，就是削尖腦袋移民國外，或者飛機觸地地核窩，散盡家財；還有寡廉鮮恥狂嘔數百萬、上千萬元遺產私招……激發民憤的「仇富心理」和「妒富心理」；更有一些「官二代」、「富二代」，恃權倚富橫行不法乃至草菅人命，引動民憤不仁，民怨沸騰……

如果不對當下的社會價值觀和財富觀上的缺陷緊抓緊補和更新，勢必引起更尖銳的社會矛盾甚至社會衝突。

第五，要重視和發揮宗教和宗教團體的特殊社會作用，開放宗教組織以慈善政策建立公益慈善機構，開展相應的公益慈善工作，實行完善的宗教政策 and 實現完整的人文關懷。

第六，擴大開放，加強國際交流，廣泛汲取國際公益慈善理念和先進的體制模式、發展模式、管理模式，實現公益慈善組織多元化、專業化和社會生活全覆盖的體制。

現代公益慈善事業的體制，在全球已有不少成熟的經驗。儘管我國國情不盡相同，不能完全照搬照抄，但是那些具有普世價值的東西還是應該廣泛交流並汲取。譬如美國公益慈善體制中的服務宗旨、服務物件、服務方式方法、服務規則等，似可擇其善者而用之。以美國而論，它在在的人口約爲中國總人口的1/5到1/4，可是其公益慈善組織卻是中國的4倍左右。美國的志願者組織多達100多萬個，志願者服務幾乎無處不在。美國有總人口75%以上的個人爲公益慈善事業捐款；以家庭統計則有全美90%以上的家庭爲公益慈善事業捐款。再譬如德國，其全國總人口不足中國的1/17，但現有的公益慈善組織卻比中國多二十萬家。這些公益慈善組織每年約能募集500億元人民幣的善款，還爲社會提供150萬個就業機會和崗位。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成熟經驗表明，在多元化、全覆蓋地爲社會服務的過程中，務必引領公益慈善組織實現專業化、在公益慈善行為中，要有明確的專業服務工作目標和可行可變的專業方案爲準則。

（五）

慈善無國界。在公益慈善事業的體制中，必須適應並實現廣泛的國際化合作。

第七，建設開放型、社會化的公益慈善事業運行體制，強化公益慈善事業的社會建設功能 and 社會管理功能。國家和政府要充分採納和運用購買服務的方式，促成公益慈善事業的可持續發展。

採取開放型政策，要引導、支援公益慈善機構、參與公益慈善機構和社會服務活動，把公益慈善作爲改善民生、服務社會的產業，而絕不採取自利的經濟目的。

在社會管理功能方面，改變「授人以魚」的傳統方式，實現「授人以漁」的現代方式。公益慈善事業要在紛繁複雜的社會生活中，不斷地「拾遺補闕」，履行社會建設功能，協助社會管理完善化。

國家和政府應當銘記小平的那句名言，黨和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就要放給群眾，放手讓社會去去做。

公益慈善事業實現社會化的體制，實現社會建設功能 and 社會管理功能的體制，可採納和運用國際上通行的卓有成效的「國際購買服務」的方式。國家購買服務，可以精簡機構、減裁冗員，實現「小政府」；公益慈善組織則有條件、有保證地進行廣泛的、專業的、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服務，實現「大社會」。

第八，建立社會型企業體制，量化並考核企業的社會價值和社會責任目標，強化企業的公益慈善理念和社會責任感。

經濟學上開通的企業要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標，是並不完善、並不全面的。它缺乏企業和利潤的公益慈善公益目標。因此，企業不惜以瀾潭潭源、污染環境、犧牲未來、禍害民生爲手段追求利潤最大化。許多企業認爲招工僱員解決就業、照章納稅，就是完成了自己的社會使命。所以，一些企業面對當地民衆的抵制和反對，一些企業在國外投資經營中受所困的與爭議甚至引發衝突，導致企業與公衆的公信力和企業的信譽力下降。這恰恰是企業喪失社會價值和社會責任的公益慈善目標所導致的惡果。企業在追求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同時，還應追求自身公益慈善社會責任的最大化。企業家應該成爲慈善家，大企業家應該成爲慈善大家。 「取諸社會，用諸社會」，這應當成爲企業家和企業持續發展的核心價值觀和座右銘。

建設社會型企業，對於中國來說還是一個嶄新的課題。所謂社會型

企業，不同於一般企業，而是以社會爲依歸，經營所得不由企業內部分配，而是全部納入社會的公益慈善事業，推動公益慈善事業的持續發展。這種朝陽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充分廣闊而深遠的。

第九，確立和確保稅收優惠的體制。從國家的財政政策上，實行大力資助公益慈善事業，大力免稅、減稅各項稅賦，同樣應該成爲一項基本國策。大惠是很大的。據統計，美國免稅或減稅的公益慈善機構就多達120多萬家。國家的稅法要鼓勵公益慈善事業的積累和發展。特別是對那些以慈善事業爲唯一目的的非營利組織、公衆醫療健康組織、慈善基金等公益慈善組織，要採用與其他純經濟企業不同的稅制和稅率。

要將福利彩票的收入作為政府公益慈善支出的財源。

第十，廣募志願者，廣拓資源。公益慈善事業的本質屬性應是自願性，自覺自願地奉公行善。因此，公益慈善事業的體制要鼓勵、允許、宣導廣泛招募志願者參與工作，形成浩浩蕩蕩的志願者大軍，用志願者的熱心善行社會服務，爲人民服務。當然，無論國際性、全國性、地區性的志願者或志願者組織，均須遵守法律，不得參與任何營利性活動。這是不言而喻的。



陳玉書先生

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公益慈善事業同樣是在發展中。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的體制，也在發展中改革和開放。中國的慈善事業儘管遭遇發展中的信任危機，儘管存在着發展中的體制性缺陷，但其生命力的偉大毋庸置疑。中華民族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傳統文化，有着不朽的仁愛、仁德、樂善好施的民族品性和民族精神。這是中華民族公益慈善事業發展、發展的基石和航標。

早在兩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仁者愛人」的學說，宣導「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慈善理念。孟子所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及老子、莊子「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也在強調積善修德。在《禮記·禮運·大同》篇中，概括了中華民族的社會理想和公益慈善的民族之族志。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謂大同。」

中華民族深厚的至今綿延不衰的文明和道德傳統，治世和治國的公益慈善理念，又不斷地包容兼容其他民族的文明來豐富自己。佛教北上東漸以來，大慈濟世、博愛超度衆生、大悲救世、拯除人間疾苦的教旨，使中華民族的善業理念更加熠熠生輝。佛經經典中指引「人人應報善」「三恩」即報父母之恩、報社稷之恩和報衆生之恩，明確確喻了人生應報公益慈善事業的道德準則。

中國儒、釋、道三教開揚慈善的教誨，深入民族的基因和血統之中。西方宗教和哲學中的人道主義內涵，爲中國的慈善理念和體制注入新的血液。這樣形成的中華民族傳承承日久而愈加發揚光大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公益慈善精神和公益慈善文化，博大精深。它告訴人們：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貧富，時無分古今，地無分內外，獻身公益慈善事業是我們全人類每一個人都應當具有的共同的信念、行動和人生目標。

目前，中國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歷史潮流湧湧向前。公益慈善的精神和事業，也在改革開放大潮中進入各個社會公共領域，爲十三億國民的民生改善和社會和諧服務。中國內地當代的公益慈善事業，一定會克服困難，鑄造出新的輝煌。

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的願景，吸引著我們每一個人。我們將爲獻身中國公益慈善事業而不懈地努力。